

和

魂

才

馬國川

著

締造明治時代
的那些人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序 讀日本，想中國	001
-----------	-----

第一編 開國・倒幕

佩里：黑船驚醒「太平夢」	006
--------------	-----

「美國人跨海而來，彷彿在我國人民的心頭上燃起一把烈火，這把烈火一經燃燒起來便永不熄滅。」（福澤諭吉）。佩里的黑船來航打破了日本酣睡了二百多年的「太平夢」，又激發了這個東方島國的新夢想。

哈里斯：瓦解日本鎖國體制的美國人	024
------------------	-----

哈里斯告訴幕府高官，蒸汽船很快把世界變成一個「大家庭」，日本的明智之舉是，放棄閉關鎖國，通過簽訂條約，以和平的方式、不失體面地加入到由國家組成的大家庭中來。

佐久間象山：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日本人	029
--------------------	-----

在外來文化衝擊下，日本應該做甚麼樣的選擇？這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核心議題。象山在著作裡明確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為遊移於傳統與西洋的幕末維新時期的日本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應對方案。

井伊直弼：主張開放的政治家為甚麼以悲劇告終？ 039

威權固然可能扭轉國家方向，開創新時代，但是如果威權者對權力沒有清醒認識，肆意弄權，最終有可能成為威權的殉葬品。這就是井伊直弼人生悲劇對後世的警示吧。

勝海舟的追問：建立一個甚麼樣的現代國家 043

在大變革時代，處境最難的往往是體制內的改革派。體制外指責他們維護舊體制，體制內又批評他們激進冒動，身處夾縫之中，左右為難。

西鄉隆盛：一位失敗的英雄 052

從一個低級武士到尊王攘夷的大將，從維新政府的卓越功臣，到領導西南起義的反叛將領，西鄉隆盛的一生折射著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艱難歷程。

吉田松陰：「向世界出發」的先覺者 074

黑船事件給日本社會帶來巨大衝擊。一位名叫吉田松陰的年輕武士竟由此萌發奇想，要乘坐黑船出國，遊歷天下。

坂本龍馬：日本近代改革的設計師 080

在眾多的歷史人物中，日本人最喜歡的是坂本龍馬。在日本高知縣的海濱，聳立著坂本龍馬的銅像。他遙望著浩瀚的太平洋，氣宇軒昂，雄姿英發。

德川慶喜：勇於退出歷史舞台的政治家

087

權力之手，握緊容易鬆開難。登上歷史舞台，政治家固然需要勇氣；退出歷史舞台，更考驗政治家的膽識。

高杉晉作：從中國帶回來的教訓

093

如果說，1861 年高杉晉作乘坐「千歲丸」訪問上海，是抱著對中國的憧憬和幻想，那麼歸國之時，帶回來的則是中國的教訓：假如日本不銳意改革，發奮圖強，就會像中國一樣衰敗腐朽！

伊藤博文：一個愛國憤青的醒悟之路

097

「如果他早生 10 年，或許他只是萩城的一個農夫，平安平凡地度過一生。」「黑船」來航不但打破了日本 200 多年的太平迷夢，也驚醒了伊藤博文的村童夢。

新島襄：日本第一個留學生的人生傳奇

102

中國有容闈而不用，日本有新島襄而信用之。兩個留學生的不同人生際遇，折射的是兩個國家的不同選擇。

第二編 「明治夢」・「強國夢」

明治維新：現代化的急行軍

108

日本之所以能夠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逐漸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當然是明治維新之功。明治天皇雖然不介入具體政務，但其進取開化的個人形象和道德模範作用，不但使其獲得了與彼得大帝媲美的聲譽，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明治維新的時代精神。

橫井小楠：影響明治維新的改革思想家

122

在橫井小楠身上，可以看到三位近代中國思想家的影子。一個是魏源，他的思想啟蒙了橫井小楠；一個是徐繼畲，他們的觀點驚人地一致；一個是馮桂芬，他的《校邠廬抗議》與橫井小楠《國是三論》一樣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

中村正直：引入西方清流，滌蕩國民心智

127

梁啟超盛讚中村正直是「維新之大儒」，對國家的貢獻不亞於西鄉隆盛等維新功勳，「其振起國民志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氣，功不在吉田西鄉下矣。」

福澤諭吉：一個國家的啟蒙老師

132

在日本，福澤諭吉的名字家喻戶曉。面額最大一萬日元上就印著他的頭像，有時候人們也將一萬日元直接叫做「福澤諭吉」或者「諭吉」。他的思想改變了一個國家的歷史走向。

千葉卓三郎：一個為國家草擬憲法的小學教師

147

作為一個山民，身處僻遠而心念天下，以一人之力為國家草擬憲法，可惜英年早逝，埋名近百年。其見識令人敬仰，個人遭際則令人感喟。

田口卯吉：重新書寫歷史

151

田口卯吉的《日本開化小史》被譽為「開創了日本學者沒有一人能夢想的新方法」。從此，日本近代第一個史學派別——文明史學誕生。日本湧現出一批文明史著，也影響了中國的歷史學家。

江藤新平：日本的商鞅

155

他被稱為「日本的商鞅」。耐人尋味的是，這兩個人的命運也頗多相似之處：都曾居高位，後亡命天涯，最終遭酷刑處死。更諷刺的是，這些酷刑都是他們自己制定的，原本想用來毫不留情地制裁別人，沒有想到自己卻先被制裁了。

「土木縣令」三島通庸：威權主義體制下的能吏

159

他是一個所謂的開發獨裁型的行政官員，在他看來，所謂的民主程序，拖延時間，效率低下，只能延遲和阻礙經濟發展，主張鐵腕鎮壓，甚至不惜將反對者冠以「陰謀動亂」的罪名「予以撲殺」。

板垣退助：「近代日本的第一個恩人」

165

1928年，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寫了一本《日本論》，在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裡，作者為板垣退助獨闢一章，並高度評價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個恩人」。

兒島惟謙：一個法官的勇氣和擔當

176

據說，「大津事件」後，當時的日本政府要員曾威脅道：「如果俄國不滿判決，出兵報復的話，日本可能會亡國！」兒島惟謙拍案而起：「如果司法不獨立，日本亡國就讓它亡國好了！」

「成金」古河市兵衛：一位企業家的功與罪

181

他利用從足尾銅礦得到的利潤廣泛投資各種行業，締造了一個工業帝國「古河財閥」，變成了這個國家最富有、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岩崎彌太郎：他與胡雪岩不一樣

186

一個棄官從商，一個由商而官，兩個人物逆向而行的人生軌跡，正是兩個東亞國家不同走向的絕妙象徵，也昭示著兩個國家不同的命運。

澀澤榮一：寧做企業不做官

190

澀澤榮一以個人的努力推動了日本近代化，也為打破官尊民卑的制度而奉獻一生，再也不涉足官場。鮮為人知的是，澀澤榮一還曾經當面勸告孫中山放棄政治活動，專心做一個企業家。

豐田佐吉：從小木匠到大發明家

195

豐田佐吉的一系列發明改變了外國織機壟斷日本市場的局面，使日本織布業躍進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而為日本產業近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三編「明治夢」・「軍國夢」

博瓦索納德：民法之爭，要民權還是要傳統？

200

民法之爭其實是日本社會思潮轉向的反映。1880 年代以後日本在改革中開始強調本國「特色」：不再追求普世價值，而是鼓吹國粹和民族主義。

大隈重信：還有比政治更偉大的事業

205

作為政治家，大隈重信一生兩次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兩次組織政黨，可是這些政治功業如水上浮萍，早被風吹雨打盡。唯有他創辦的早稻田大學，走過 100 多年風雨，至今屹立。

久米邦武：挑戰國家意識形態的學者

210

「久米邦武筆禍」事件被稱為「日本近代史學轉型的一大勝利」。作為堅持學術獨立、勇於向國家意識形態挑戰的歷史學家，至今備受日本學界的尊敬。

田中正造：不應該被犧牲在工業進步的祭壇上

215

日本在「富國強兵」的過程中，大力發展工業，經濟騰飛的同時，也產生了環境污染問題。在政府看來，這是實現工業化的必要代價。作為日本環境保護的先驅，田中正造認為經濟近代化的首要目標是為人民的福利做出貢獻。

中江兆民：預言日本帝國興衰的思想家

220

思想家是**非常寶貴的**。尤其是那些處於轉型中的國家，需要一大批思想家來引領。
中江兆民就是日本近代化過程中一位難得的思想家。

內村鑒三：寧做與民眾對立的「國賊」

226

近代以來，日本多次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深受國家主義教育影響的國民積極支持戰爭，全國幾乎形成一個聲音，不同聲音者則受到殘酷壓制。正因為這樣，敢於發出不同聲音的理性人物才更加可貴。

幸德秋水：「這是一場暗黑的審判」

231

他是日文版《共產黨宣言》的譯者，《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就參考了日譯本。被以「大逆罪」秘密審判、處死前，他痛斥道：「連一個證人調查都不做，卻膽敢作出如此判決——這是一場暗黑的審判，汝等要知恥！」

元田永孚：「臣民」教育始作俑者

236

教育到底培養甚麼樣的人？改革派主張培養具有獨立人格的現代公民，而保守派堅持要培養盲目愚忠的臣民。要公民，還是要臣民？這是一個影響國家未來道路的關鍵選擇。

加藤弘之：思想的變節者

241

從一個天賦人權的思想旗手，滑向社會達爾文主義，再進一步成為對外侵略的理論製造者，加藤弘之的思想之路值得重視，因為這條思想軌跡也正是明治維新時代日本走過的道路。

福地源一郎：一個報人的複雜人生

246

他豐富的經歷是明治時代的一面鏡子，折射著這個國家在近代化過程中與媒體的複雜關係：從利用到打壓，從寄予厚望到嚴加管制。這個過程不僅導致媒體人動搖分化，也使得民眾從「文明開化」重回愚昧封閉，成為國家的工具。

森有禮：從自由主義到國家主義

254

從啟蒙先鋒、堅定的自由主義者遽變為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的堅定信奉者和最初的施行者，這是森有禮個人的悲劇，更是那個時代許多日本啟蒙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悲劇。

伊藤博文：憲法之上的「元老政治」

265

1889年明治天皇賜予伊藤博文「元勳優遇」，同時下了一道聖諭：「縱令辭職也勿離宮闕，重大事件發生時當答朕諮詢，國家有事之日亦當復出以分朕憂」。這道聖諭反映了「元勳優遇」的本質：元老就是天皇重要國務的最高諮詢者，他們享有「不在其位也謀其政」的政治特權。

山縣有朋：軍國主義理論的炮製者

270

山縣有朋主張以軍刀作後盾，大力推行軍國主義路線，從而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奠基人。耐人尋味的是，他的主張也得到了民眾的支持。

德富蘇峰：被野心驅使的戰爭狂人

275

從一個宣揚自由民權的思想家，轉變為侵略戰爭的狂熱鼓吹者，需要多少年？德富蘇峰的答案是：3 年。

明治之死：結束，還是開始？

285

日俄戰爭意味著日本完成了明治維新以來的堅定目標——國家獨立和與列強並立，可是隨後日本似乎失去了目標。「愛國主義」曾經確定自己的使命是把日本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如今卻已被證明無力提供新的目標了。日本人何以自處，日本向何處去？

後 記

291

參 考 書 目

295

序

讀日本，想中國

我將全部文章仔細修改一遍之後，決定暫時告別日本近代史。我把書架上和堆放在地板上的有關書籍全部裝進紙箱子，卻猶豫是否把它們貶謫到地下室去。這是一個冬日的上午。連續數日的霧霾之後，北京天氣出奇得好，清亮的藍天上竟然有片片白雲，頤和園裡的萬壽山歷歷在目，玉泉山上的佛塔也清晰可見。溫暖的陽光投射到地板上，光束中有無數的顆粒在飛舞。我心中既有輕鬆的喜悅，也有些許告別的惆悵。

2016年8月1日，我來到東京，開始了四個月的訪問學者生涯。我「掛單」在慶應大學，住處距離校園很近。當天傍晚，我走進這所久已聞名的大學，徘徊在創始人福澤諭吉的雕像前，思緒萬千。這個人一生沒有涉足官場，卻以自己的思想引領日本走向近代文明。作為遠東之東的島國，日本從被迫打開國門到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書寫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故事。多少風雲人物活躍在這段歷史中，壯懷激烈，成敗興亡，難道不值得追尋嗎？

就是從那一天起，我決定寫一些文章。我閱讀這個國家的近代史，外出遊覽也有意去探尋近代日本的史蹟。每有興會，就把那些可感之人、可述之事記錄下來。我在「界面」網站開了一個專欄「扶桑讀史」，大致每週發

表一篇。這些文章獲得了讀者的共鳴，既然吾道不孤，我也就更加努力。2016年11月底回國後，我繼續寫「扶桑讀史」專欄，直到2017年11月中旬，完成最後一篇《明治之死：結束，還是開始》，才結束了一段奇特的閱讀和寫作體驗。對我來說，集中這麼長時間閱讀另外一個國家的歷史，這是第一次。

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我一共完成了六十篇文章。這些文章的歷史跨度，從1853年的「黑船事件」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整整六十年時間。這不是巧合，而是我有意為之。不過，這些文章絕不是按年度選擇的，所寫的人物或事件都是我認為重要的。我想通過這些人物和事件，反映日本告別舊體制、走向近代國家的過程。

一位不認識的朋友問道，「讀你寫的這些文章，為甚麼感覺就像在寫中國呢？」我心中也常有類似的困惑。夜闌人靜之際，我面對日本近代史上的那些風雲人物，追索其思想軌跡，審視其進退選擇，也時常陷入迷惘，為甚麼他們和中國人物這麼像呢？比如那位森有禮，當年是日本思想啟蒙運動的健將，後來卻成為極力維護專制體制的國家主義者。中國近代以來也這樣的思想轉向者還少嗎？再如，日本開國之後的「愛國賊」們，以愛國者自居，對那些被他們認為是賣國的本國人士橫刀相向，肆意砍殺，中國這樣的「愛國賊」不也是很多嗎？

其實，在1853年之前，日本和中國一樣，與世界隔絕，酣睡在天平夢中。正如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四書》中所說，「若使地球未闢，泰西不來，雖後此千年率由不變可也。」問題是，堅船利炮打破了停滯寧靜的迷夢，東亞開啟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管是中國還是日本，都面臨同樣的「國家向何處去」的問題。

閱讀歷史就像站在萬仞高崗，俯瞰大江東去。雖然已經知道了結局，但是深入到歷史的具體情境中，看那些活躍其中的人物的思考行動，我仍然常

常為他們扼腕歎息。沒有人知道這個國家的最終走向，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理念在行動，就像大江中湧動的浪花，相互撞擊，時起時落，最終匯成巨流，澎湃激蕩，奔向汪洋。對中日兩國來說，從被推入現代化的巨流的那一刻起，它們的命運是共同的，就是走向世界、走向文明。

儘管中日兩國在具體路徑選擇上迥乎不同，一個被動而頑固，一個主動而決絕，但是歷史大脈絡驚人地相似，因為它們要完成的歷史進程是一致的，活躍在歷史中的人物都直接或間接對「國家向何處去」這個基本問題作出回答，並據此決定個人的選擇。因此，不同國度出現許多相似人物、相似事件，並非不可理喻。

我在讀日本的時候，心中想的是中國，因為中國至今仍然面對著一百多年前的命題。從 1853 年到 1912 年，日本 60 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歷史進程，也濃縮了中國 1840 年以來的歷史。由於中國現代化的曲折反覆，所以現在仍然可以在日本那 60 年裡找到對應的問題。雖然歷史不能提供答案，但是可以啟發人們的思考。

比如，19 世紀 90 年代，追趕西方國家初見成效之後，日本社會就開始出現了宣揚日本「特色」、維護「國體」的保守主義輿論。再如，在 20 世紀初實現工業化之後，日本出現了「和平崛起」與「武力崛起」的爭論。雖然國家不同，時代各異，但是我常常為中日兩國的相似性而驚歎，恍惚有時空錯亂之感。

自從 19 世紀以來，世界各國都在現代化道路上競走。追趕型國家裡的知識分子，重要的歷史使命就是衡量本國在這條道路上已經達到了甚麼程度，不斷地提醒國家要走正確的道路。這就是思想啟蒙的重要內容。因為正確的道路只有一條，而錯誤的道路卻有無數。多歧路，今安在？一個國家一旦踏上錯誤的道路，就會付出慘重的代價。就像日本，在 1930 年代走上軍國主義的不歸路，給全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因此，思想啟蒙的道

路是艱難而漫長的。只要一天不成為現代文明國家，知識分子就一天也不能鬆懈。

隨著國力的增強，中國國內出現了沾沾自喜、自驕驕人的輿論氛圍。一些人士忙於總結「中國模式」、「中國經驗」，對於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不屑一顧。誠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說，「只懂得一個國家的人，他實際上甚麼國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這句話對中國來說，非常有現實意義。因為如果沉溺在已有的成就，不以比較分析的視野來衡量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得失進退，就難以清醒而深刻地認識現實中國。古人說，以史為鑒，可以知得失。同樣，以日本為鑒，可以知進退。

在這個意義上，讀懂了日本，也就讀懂了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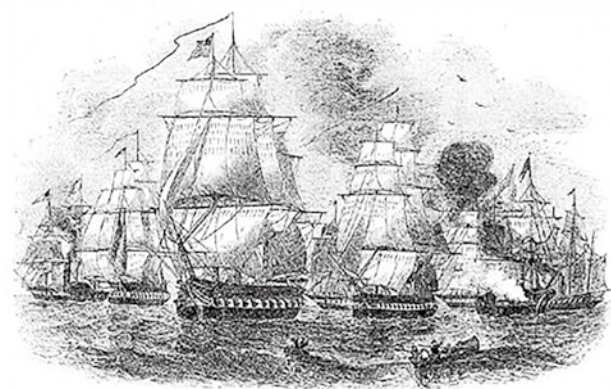
是為序。

2017年12月5日

馬國川

北京 雙清路

第一編 開國・倒幕



佩里

Ma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年—1858年

美國海軍將領。1853年，1854年兩次率領遠征軍來到日本，最終與幕府簽署《日美和親條約》，打開了日本緊閉二百多年的國門。

佩里：黑船驚醒「太平夢」

日本不愧是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國家。從東京乘火車，沿著海岸南下，一路上都是鱗次櫛比的都市叢林，幾乎看不到鄉村。這條鐵路的終點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橫須賀市。鋪開地圖，發現這個城市位於東京灣最狹窄的入口處，扼守門戶，果然是一個軍事要地。據說在江戶時

代，奉行閉關政策的幕府為對付外國船隻，就在這裡建築了不少炮台。一百多年過去，這些炮台還在嗎？

走出站台，看見出口處懸掛著一個獨特的車站標誌，中間是一個鐵錨，一隻和平鴿正展翅飛過。鐵錨提醒人們，這裡是一個海港。果然，在街頭就嗅到了大海的味道。這裡和東京一樣乾淨整潔，不同的是，洋溢著歐美的氣息。許多店鋪都用日語和英語書寫，有些乾脆只用英語。一個名字叫「女神酒店」的地方甚至把自由女神像搬上了樓頂。街頭有很多美國軍人，身材高大健壯。橫須賀是美國在亞洲最大的海軍基地，素有「東洋第一軍港」之稱。

站在海濱公園，可以清晰地看見海港裡停泊的眾多軍艦。藍天白雲襯托下，這些軍艦都顯得那麼威武雄壯。誰能夠想到，一百多年前的港灣裡都是木帆船。那時，橫須賀還是一個小漁村。直到 1865 年，江戶幕府創辦第一家造船廠「橫須賀製鐵所」，這個地方才迅速發展起來。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在同一年，曾國藩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造船廠——「江南製造總局」。對於追趕現代化的國家而言，「富國強兵」是它們的共同夢想。

1877 年，明治政府把這裡定為軍港，海軍在沿岸廣建炮台、兵營和學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裡更是日本海軍重要基地。1945 年日本投降後，美軍在橫須賀登陸。後來日本根據《日美安全條約》，將橫須賀基地正式提供給美軍。

不過，我的興趣並不是看軍艦，而是尋找一個公園。在一個叫作「久里濱」的小站附近，我終於找到了「佩里公園」。公園面朝大海，佔地並不大，滿是綠樹鮮花。公園的中心位置是一座巍然聳立的紀念碑，花崗岩底座上鑲嵌著一塊巨石，上面鐫刻的是漢字「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上陸紀念碑」，落款是「伊藤博文」。

就是這裡，著名的「黑船來航事件」就發生在這裡。石碑底座前面

是一幅石刻的世界地圖，標示著佩里艦隊自美國來到日本的航路，還用日英兩種文字寫道：「1853年7月8日，來到浦賀海面的美利堅合眾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在此地的久里濱海岸登陸，將總統菲爾摩爾的親筆信遞交給江戶幕府，翌年在神奈川締結了日美兩國之間的友好條約，這一系列的事件成了將幕府統治下的鎖國狀態的日本拉回到了世界的原動力。」

一 · 闖進江戶灣的不速客

其實，第一個叩開日本大門的，本來有可能是一個俄國人。

在獲悉美國正在計劃遠征日本的消息後，俄羅斯急忙派遣一個叫做艾夫非米·普提雅廷的人率領一支四艘軍艦組成的小艦隊，離開歐洲，駛向日本。

普提雅廷？這是一個非常生疏的名字。我在網上查閱，才得知此公經歷非凡：他曾參加過俄羅斯探險家拉扎列夫的船隊環遊世界，也曾參加高加索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俄羅斯與清政府簽訂《中俄天津條約》，俄國的全權代表就是普提雅廷。後來，他成為俄羅斯海軍上將，還擔任過教育部長。

可以看出，在俄羅斯的歷史上，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人物。可惜，普提雅廷不如佩里幸運。不僅僅是因為他比佩里晚到了幾個星期，還由於他登陸的地點是在日本西南地區的長崎——一個遠離日本政治中心的港口，而沒有像佩里那樣長驅直入江戶灣，與幕府將軍的府邸僅有不到百公里。

佩里出生在美國羅德島州，父親和哥哥都是海軍將領。佩里本人也於1809年加入海軍，曾和兩個哥哥一起參加1812年的英美戰爭。1837年美國建造出第一條海軍蒸汽船「富爾頓號」，同年佩里晉升為海

軍上校。佩里強化海軍以蒸汽船為主力的政策，並且實行士官教育，被稱為海軍的「蒸汽船之父」。

19 世紀上半葉，美國還是一個正在追趕歐洲的後進國家，不過已經顯現出後來者居上的勢頭。日本海域出現的捕鯨船絕大多數是美國人駕駛的。時值工業革命期間，美國要從鯨魚油中提取照明用油。隨著鴉片戰爭打開中國的大門，一些美國人認識到，太平洋海岸線是美國的經濟機遇。財政部長羅伯特·J. 沃克在 1848 年的評論揭示了這一點：「通過我們最近在太平洋上的所得，與我們間隔著一個平靜大洋的亞洲已然成為我們的鄰居，邀請我們的蒸汽船沿著比全歐洲還要巨大的商業航道前行。」

日本位於舊金山到上海的必經之路上，地理位置重要性越來越凸顯。1852 年 3 月，佩里就任東印度艦隊司令官，被授予「日本開國」的指令。11 月份，佩里率艦隊從美國東海岸啟航，向西橫跨大西洋。從大西洋進入印度洋，從印度洋進入太平洋，佩里艦隊越來越逼近被視為「半開化國家」的日本。

1853 年 7 月 8 日傍晚，正在久里濱海岸訓練的六十多名武士發現，有四艘外國船隻朝江戶灣駛來。這些船體龐大，身披黑色鐵甲，不斷噴出黑煙，如同怪獸一般發出轟鳴。這是日本人第一次見到近代黑色鐵甲軍艦，因此被岸上那些震驚的日本人稱作「黑船」。事實上，佩里艦隊裡只有兩艘是蒸汽式軍艦，但是旗艦排水量兩千四百五十噸，而當時日本最大船隻最多不過是一百噸級別。這四艘軍艦共有六十三門大炮，而當時日本在江戶灣的海防炮射程及火力可與這四艘軍艦相比的大約只有二十門。

當地官員乘船趕到，並登上了美國艦艇。美國人要求，日本高級官員接受總統致幕府將軍的信函。日本官員稱，按照日本之國法，高官不可接待外國船隻。佩里派出四艘測量船，在蒸汽軍艦的護衛下，深入江

戶灣進行水文測量。日本派出數十隻警備木船與美國測量小艇對峙。場面緊張，假如有擦槍走火，一場中國式的「鴉片戰爭」爆發，日本將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意外沒有發生。僵持了六天後，幕府最終同意美國人登陸。接受美國總統來函儀式的地點，就是我參觀的佩里公園。站在公園裡，望著海邊，我感到自己想像力的匱乏，想像不出美國人登陸的場面。幸好，佩里留下了一部《日本遠征記》，記錄了當年的場景。

那一天，美國海軍陸戰隊和水兵約三百人，攜帶者上好刺刀的滑膛槍上岸，把海濱圍成半圓狀向「招待所」行進，在「招待所」兩側，一隊日本護衛聚集在一起，相當凌亂。與其他士兵不同，他們的服裝，右側護衛身穿無袖外罩，用寬幅裝飾腰帶將它繫在腰間，下穿灰色長褲，寬幅肥大的褲子在膝蓋處收緊，頭纏白布猶如穆斯林頭巾。他們用帶刺刀的滑膛燧石火槍武裝起來……

美國總統的書信外邊包有一層藍色的天鵝絨，放在一個純金的圓形容器裡，容器外面蓋有金印，在遞交國書時，雙方代表都保持沉默，沒有進行任何實質性的會談。在信中，菲爾摩爾總統說，進入 19 世紀世界發生了變化，美國加州和中國之間的航線受到期待。為了從鯨魚油中提取照明用油，美國捕鯨船大量開赴日本沿海捕鯨，因此要求日方提供海難救助。總之，美國的要求有三項：通商、補給、救助遭遇海難的船員。

日本官員要求佩里轉往長崎登陸。佩里堅決拒絕了。假如真的聽從了日本官員的要求，佩里一定會像俄國人一樣一事無成。日本官員又藉口說，要得到天皇的批准方可接受條約。佩里並沒有採取激烈措施，而是答應給予對方考慮時間，明年春天再來聽取回覆。

三天後，佩里艦隊啟航，漸漸消失在雲海蒼茫處。日本官員終於長出了一口氣。

二・日本幕府的「鎖國令」

在這一切發生之前，日本一直是一個與世隔絕、安心於太平生活的國度。「黑船」打破了這個島國兩百多年的太平夢。

黑船到來的當天夜裡，江戶城一片混亂，武士們忙於備戰，城外大小寺院內鐘聲齊鳴，婦孺淒厲地哭喊，有錢人準備逃往鄉間，更多的人擁進神社，擊掌禱告神靈，乞求「神風」再起，摧毀「黑船」……（加藤祐三《黑船異變》）

這是一段關於「黑船來航」事件在江戶引起的震動的描寫。很生動，可惜歷史事實並非如此。江戶是當時幕府將軍所在地，是日本的政治中心。當時江戶的民眾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恐懼，許多人甚至駕駛船隻趕到橫須賀參觀美國艦隊。至於執政的幕府高官們也不意外，因為他們早就知道美國艦隊要來的消息了！

日本從 1633 年就頒佈了鎖國令（禁海令），清心寡慾地度過了兩個多世紀。漫長的二百多年間，除了漂流國外的漁民，沒有日本人去過國外。但是翻看歷史我才驚奇地發現，日本並不像大清王朝那樣閉目塞聽，而是一直保留著觀察外部世界的信息通道。

最大渠道來自荷蘭。16 世紀荷蘭人就來到日本經商，1633 年頒佈鎖國令後（比康熙海禁還要早 80 多年），荷蘭人成為唯一允許留在日本的西方人。幕府在長崎附近以人工填海方式造了一個數萬平方米的小島，名曰「出島」，強令荷蘭人遷居此島，以避免與日本國民的接觸。荷蘭船隻被允許來往日本，但是每年都要向幕府報告海外信息。從 1842 年起，幕府要求荷蘭每年提供《荷蘭別段風説書》，報告此前一年發生的海外大事。信息之豐富，令人驚異。在佩里來航的前一年，

1852 年的《荷蘭別段風説書》就準確地報道了佩里艦隊的船名、噸位、炮數、乘員人數等信息，而且揭明了美國的目的。

為甚麼甚麼是 1842 年？因為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不但是中國歷史的關鍵時點，也是東亞歷史的轉折點。這一事件幾乎在第一時間就傳到了日本。

因為除了荷蘭，日本也允許中國商船在長崎入港。幕府規定，入港的中國商船船主必須向管理外貿事務的長崎奉行（官名）報告中國的情況。這種報告稱為「唐人風説書」，又叫「清商口單」。1840 年，鴉片戰爭的消息通過中國商人傳到日本。由於日本人把鴉片稱為「阿片」，因此有關鴉片戰爭的情報統稱為「阿片風説書」。現在從各種史籍上能見到的阿片風説書有十幾種，具體報道了鴉片戰爭發生的原因、進程和結果。另外，中國商船帶去的記載鴉片戰爭的中國書籍如《夷匪犯境聞見錄》《英國侵犯事略》《乍浦集詠》等書，也是日本人獲得鴉片戰爭信息的一個來源。

最有意思的是，鴉片戰爭的消息傳到日本之後，日本坊間很快就出現了不少描述鴉片戰爭的作品，反應之快，令人吃驚。1849 年出版的小說《海外新話》就生動描寫了鴉片戰爭的過程。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嶺田楓江的藩士，他在該書序詩中點明了寫作此書的宗旨：「天賜前鑒非無意，婆心記事亦微衷。嗚呼！海國要務在知彼，預備嚴整恃有待。」他的目的，就是要日本吸取中國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加強海防，防禦外來侵略。為了適應日本一般武士與庶民讀者的口味，這本書採取了當時日本民間流行的軍談讀物即描寫戰爭的章回小說的體裁，語言也盡量通俗易懂。不過，由於出版前未送官方審查批准，竟被幕府指責為「異教妄説」，勒令毀版並列為禁書，作者也被處以禁錮之刑，入獄二年。甚至連為該書插圖的畫師也受到牽連，被捕後死於獄中。但是，由於《海外新話》一書很受讀者歡迎，第二年又被秘密加以重印出售。

一個大國竟然被打敗，此事在日本引起極大的震動。1844 年，當時荷蘭國王致信日本政府，要求以更自由的方式解決外國貿易問題。來信警告道，由於日本阻礙了歐洲由工業革命和人口增長所創造的商業野心的擴張，可能遭受中國已然遭受的命運——

地球上各個國家間的交往正變得日益密切。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正把她們凝聚在一起。汽船的發明使得相互之間的距離變得更小。在這一關係迅速發展的時期，傾向於保持孤立的國家將不可避免地與許多其他國家為敵。(《劍橋日本史（第五卷）：19 世紀》)

德川幕府回應說，「鎖國令不可能被拋棄：既然祖先的法律已經被制定，子孫後代必須遵守。」但事實上，得知清朝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消息後，幕府已經悄然改變了強硬的鎖國政策。

1825 年，幕府曾下達「無二念打拂令」，即不分情況，只要有外國船（中、荷除外）駛近日本沿海，立刻開炮驅逐。但是 1842 年，鴉片戰爭的戰火剛剛熄滅，幕府就發佈了「薪水令」，允許給外國船提供燃料、食品和水，但之後要命其盡快離開日本，以防無端挑起戰爭。

日本作為一個海洋國家，幕府所在地江戶是一個臨海城市，海防薄弱。佩里曾說，若有小型炮艦兩三艘，就足夠破壞江戶。因此，面對黑船事件，幕府以滿清為鑒，沒有採取激烈對抗措施，而是冷靜避戰，虛與委蛇，終於將其打發走。

或許，美國人不會再來了吧。

三．被打開的國門

從橫須賀北上，不到半個小時的火車行程，就來到了橫濱。這是日

本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個著名的港口。沿著海岸線，是長達一公里著名的山下公園，傳說是世界上最佳散步之地。道路上鋪的是花磚，道路兩旁是古老的銀杏樹。雖然是盛夏季節，但有海風拂面，非常愜意。

想起朱光潛先生在一篇文章裡引用過的一句話「慢慢走，欣賞啊！」我的心情就是如此。閒閒地在公園裡漫步，一會兒望望左側的大海，海面上游弋著各種各樣的輪船；一會兒望望右側林立的現代化高樓，一幢幢直衝雲霄。抬頭，湛藍的天空中白雲悠悠。公園裡有許多雕塑和紀念碑，都充滿了歐美風格，穿行其中，就像走在波士頓的海邊。

公園裡有一座一百零六米高的燈塔。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十角形燈塔，是為了紀念橫濱開港一百週年而興建的。我登上塔頂的展望台，整個港口盡入眼底。望著遼闊的海灣，我想，162年前佩里艦隊就是出現在這片海面吧。1854年2月13日，佩里再次來到日本。這次他率領的艦隊比上次多了三艘艦艇，而且他也沒有在橫須賀停留，而是直接北上，深入江戶灣，在這片當年叫作「神奈川灣」的水域下錨。他向日本提出，要求對他去年帶來的美國總統書信給予明確的答覆。

這次給幕府的震動比上次更大，因為局勢很明顯，不可能再像上次那樣找藉口將不速之客打發走。《現代日本政治史》裡這樣描述當時執政者的驚恐——

美國軍艦在1月28日（日本舊曆）從浦賀開船，停泊在神奈川灣，幕府見狀驚恐萬狀，認為美國軍艦將繞過羽田灘而進入到品川，如果談判一旦破裂，江戶將在美國人的大炮之下，化為雲煙。從神奈川到江戶之間，瞭望所比比皆是，告急的書信如雪花飛來。在將軍所駐城堡，忽然得知夷船向江戶駛來，大恐，忽然又得知夷船向浦賀駛去，又放寬了一下心。就這樣忽驚忽安，日達數次。後經詳細調查夷船轉舵原委，據說，因為潮汐漲落以及風向的變化，夷船便在停泊的原地改變方向。哨

所據此上報，才引起一場虛驚等等。

無奈之下，幕府不得不同意正式談判。談判地點就在橫濱——當年是一個僅有一百來人的小漁村。佩里本人有一幅著名的繪畫作品，生動記錄了當年的場面：在橫濱接待所前面的海面上，美國軍艦一字排成，把接待所納入射程範圍。美國士兵分兩列整齊排開，佩里自己率領一隊士兵登陸。一些日本武士打扮的人迎面站立，似乎在歡迎。畫面右側是臨時搭建的談判場所，旁邊的大樹據說至今仍然存活著。

這是東西方之間的一次奇妙會面。就像隨團的傳教士衛三畏所說：「手持火銃的士兵列隊緊湊，進行操練；圍著襯裙、穿著木屐、佩戴兩柄劍的士兵，所有人都亂哄哄的，跟烏合之眾一樣——所有這樣或那樣的事物，均凸顯出我們的文明和習俗同這個與世隔絕的異教徒民族之間的差別。」

十七年前發生的一個事件，對 1854 年在橫濱舉行的美日談判發生了很大影響。

1837 年，一艘非武裝的美國商船「馬禮遜號」載著七名日本漂流民，從澳門出發，抵達日本浦賀近海，以此主動示好，希望達成與日本互利通商的目的。不料日本幕府的執政者根本不領情，下令炮擊「馬禮遜號」，迫使其倉皇撤離。此事在國際社會影響很大，也引起當時日本思想先進學者的批評。

一位名叫高野長英的學者甚至寫了一本小冊子《戊戌夢語錄》，尖銳地批評說，「如果幕府對它們訴諸武力驅逐，日本就會被看成一個不辨是非的野蠻國度。我們是一個非正義國家的惡名將會傳播看來，而日本將會失去它作為一個禮儀之邦的美譽。結果將難以預料會有甚麼甚麼災難降臨在我們頭上。」

17 年後，「災難」終於降臨了。黑船來航，幕府被迫走到談判桌

前。在談判一開始，佩里就依據例舉「馬禮遜號事件」，批評日本連本國漂流民也不救助，是「不仁之至」的非人道主義國家。

幕府談判代表反駁說，佩里應該看到日本的「國政之善」。日本政治既非不仁，也重視人命，而且遠勝其他國家，因此日本才能夠在過去將近三百年間一直太平無事。何況「馬禮遜號事件」已經是 17 年前的事情了，現在日本已經允許為外國船隻供應物資，而不再像以前那樣見到外國船隻就開炮驅逐。

談判持續了將近一個月，正式會談四次，談判地點也改了一次。談判期間，雙方都戒備森嚴。幕府談判代表竭力建議美國接受原來荷蘭通商的條件，以長崎為口岸；佩里則拿出 1844 年中美《望廈條約》給日本看，要求立即開放 3 到 5 個通商港口。最後，幕府不得不接受美國的條件。

1854 年 3 月 31 日，日本與美國正式簽訂了《日本國米利堅合眾國和親條約》（又稱為《神奈川條約》）。條約規定了漂流民的救助、引渡，日本同意開放下田、箱館等港口，美國還可以派領事駐下田，等等。這是日本與西方國家簽訂的第一個國際條約，日本的國門終於被敲開了。

正如佩里在他給美國國會的報告裡所說——

日本已經向西方國家開放——向日本說明她的利益將隨著與他們的交往而擴大則是西方各國的分內之事。並且，隨著偏見的逐漸消失，我們可以期待看到未來越來越自由的商業條約的談判，這不僅僅對於我們自己，對於歐洲所有海洋強國，對於日本的進步，以及對於我們全人類的發展進程都是有利的。（《劍橋日本史（第五卷）：19 世紀》）

條約日本語批准書原本，在幕末江戶城火災中被燒毀。其中一份批准書原本內文以荷蘭語書寫，由美國方面持回國內，保管在美國國家

檔案管理局，目前仍在。2004年日美交流一百五十週年紀念之際，美國以復印本條約批准書致贈日本。

談判結束，雙方緊張的情緒都平復了下來。條約簽訂後，佩里在美國艦上舉行了盛大招待宴會，並向幕府大將軍贈送了禮品火車模型、電報機、照相機等，而幕府卻只能用力士搬運大米作為回贈。後來，佩里的禮品在橫濱公開展覽，這些近代工業文明的產物吸引了大量日本觀眾。

在鎖國200多年的封建社會中生活過來的日本普通民眾，也和當時的中國人一樣毫無思想準備。當「黑船」開到箱館的時候，當地民眾不知道來者何物，有一半以上的人逃到外地去了。在下田，美國的官兵排列隊伍，遊覽鄉下，男女民眾觀者如堵。日本農村的景色也給美國人深刻的印象。他們發現，「道路兩旁的農家就像一幅即將收起的舞台背景畫，你根本想不到它是用來住人的。茅草屋頂最初是黃顏色的，時間一長就變得柔和與素淨起來。屋頂上雜草生息，大株雜草周圍又繁衍出一小撮一小撮的草尖。屋脊上大朵百合歷歷可見」。

美方翻譯衛三畏還專門起草了一份文書給日方，闡明西方世界在處理國際關係時所遵循的準則，以及向西方開放對於日本的好處。這對日本此後的開放政策應該發揮了一定作用。

四 · 羅森：擠進大歷史的小人物

1854年，佩里率領美國艦隊第二次進入江戶灣，在一個叫橫濱的小漁村登陸。僅僅三四十年後，當年荒涼的小漁村就奇跡般地變成了一座繁榮的城市。「橫濱開港資料館」以大量資料生動地講述了一個城市的成長史，其中的一張《美利堅人應接之圖》吸引了我。

這是日本著名畫師楡形赤子的作品，當年他受命為「黑船」上的來訪者一一畫像。我在畫中驚奇地發現，在一群美國人之中，竟然有一個

戴著瓜皮帽、拖著長辮子者。是中國人嗎？仔細看，此人長著一張圓臉，矮矮胖胖，手持摺扇，畫像旁邊寫著「清國人羅森」。果然是中國人！我還發現，另外還有幾幅他打傘、搖扇和寫字姿態的畫像。在當時參加接待美方代表的日方人員的筆記、日記和雙方會談記錄上也常常可以看到羅森的名字。也就是說，有一位中國人見證了日本開國的歷史場景。

這個中國人到底有甚麼甚麼傳奇經歷，竟然參與了日本的歷史進程，見證了日本的歷史性時刻？

羅森是廣東南海縣的一個文人，後來經商。他在香港居住時曾與英美傳教士有來往，會說一點英語，但是不懂日語。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以翻譯的身份跟隨美國艦隊來到日本。

佩里首次日本之行時，由著名的美國傳教士衛三畏做翻譯。衛三畏感到與日本人打交道、訂協議都離不開漢文，於是在佩里艦隊再次前往日本時，便邀請友人羅森同行，一起作為美國艦隊的翻譯。

當時的日本人基本不懂英語，美國也鮮有人精通日語。羅森不懂日語，也不懂荷蘭語，但是可以用漢字和日本人在紙上「筆談」，因為當時日本的官員和讀書人都熟悉漢字。幾乎所有的翻譯都倚賴於羅森和衛三畏。於是出現了奇怪的談判場面：美國談判官員說英語，衛三畏口譯為中文，羅森寫下來給日本官員看；日本官員寫下漢文，羅森唸出來，衛三畏再翻譯成英文給美國官員聽。在外交史上這都是少有的奇聞。

美國與日本的談判持續了將近一個月，談判期間雙方戒備森嚴。羅森在日記裡這樣寫道，「初事，兩國未曾相交，各有猜疑。日本官艇亦有百數泊於遠岸，皆是布帆，而軍營器械各亦準備，以防人之不仁。」最後日本不得不接受美國的條件，與美國正式簽訂了《日本國米利堅合眾國和親條約》。這是日本與西方國家簽訂的第一個國際條約。本來可

能發生的日本的「鴉片戰爭」就這樣結束了。

在日本期間，許多日本人士主動與羅森交往、筆談，因為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慘敗讓他們感到震驚，急於了解中國到底發生了甚麼。羅森也向日本人士介紹了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勢，還把自己寫的關於太平天國的小冊子《南京記事》借給日本官員閱讀。這部著作很快就被翻譯成日文，改書名為《清國咸豐亂記》，在日本廣泛流傳。

當時，許多日本人對於現代世界也缺乏了解。一位保守的日本官員專門用漢文給羅森寫了一封信，認國家應該與外國斷絕交往，因為外來者往往欺騙愚蠢的國民，他們唯利是圖，沒有禮讓信義。

和這些日本人比起來，羅森的見識也不見得有多高明。他對日美談判本身著墨不多，而是以獵奇的眼光打量日本。在後來撰寫的《日本日記》一書中，他大量描寫的是日本社會的「怪異」之處。羅森處處將日本與中國進行比較，對於日本的種種「落後」之處很是不屑。例如，他以「男女授受不親」的儒家倫理道德來描寫日本的男女共浴，「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於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將淳樸自然的男女關係醜化成了一個男女關係淫亂的社會。

羅森雖然對日本也有讚賞之處，但是在他的筆下，流露更多的是天朝上國俯視東方蠻夷的優越心態，很有以「文明人」自居的意味。鴉片戰爭已經發生十幾年，中國已經被推進世界的大門，羅森還有這種心態，殊為可笑。更悲哀的是，他沒有意識到，正在他身邊發生的事件即將改變日本的歷史，也將改變中國的命運。

和羅森比起來，那位介紹他參與美日談判的漢學家衛三畏的認識要深刻得多。他剛剛到達日本一週時，在給他弟弟的信中寫下的話至今值得三思：「和中國人比起來，日本人給人的感覺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加充沛。但是我覺得他們的生活並沒有中國人那樣舒適。他們的行動很不自由，也沒有中國人那樣有靈性。不過，與中國人相比，他

們有著更強的進取心和好勝心。當這兩個民族都認識到與別國進行交流的重要性以後，很可能日本人會在世界上為自己謀取到更高一些的地位。」

要求羅森有敏銳的歷史眼光，對中國提出預警，確實有些苛求。但是，一個國家在歷史轉折的時刻，畢竟需要一批有眼光的人。19世紀中期日本令人吃驚的現象之一，是受過教育的日本人觀察外部世界的強烈願望，甚至還有吉田松陰這樣希望通過偷渡了解世界的卓毅人士。他們在國家受到外來衝擊之時，決心前往西方了解外部世界。他們共同擁有一個偉大的願望：就是決心向西方學習，希望能夠由此使他們的國家做好迎接新挑戰的準備。

反觀當時的中國，儘管已經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敗了，但精英人士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國的幻想之中，拒絕睜眼看世界。比如1840年文淵閣大學士琦善到廣州接替林則徐後立即宣佈：「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洋情事。」他們沉迷在古老的文明不能自拔，自認為是東方的文明大國，甚至臆造出中國道德優於西方之類的怪論來自我安慰，渾然不覺世界在發生巨變，更不肯主動地走向世界。直到40年後的甲午海戰才猛然醒來，發現日本已經將中國遠遠拋在後面，追趕不及。

談判結束後，羅森搭乘美國軍艦返回中國。據說，途經鎮海時，他在當地收購了一批生絲，運回廣東後賺了一筆。翻譯是臨時的，歷史對他來說也沒有那麼重要，他只是一個小商人。

無數普通人活在歷史的夾縫裡，悄然地生，無聲地死，在這個世界上留不下一點痕跡。羅森是幸運的，偶然的機會讓他擠進了大歷史。遺憾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見證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更理解不了日本開國的意義。

馬克斯·韋伯曾說，「觀念創造出的『世界圖景』，時常像扳道夫一樣決定著由利益驅動的行為的發展方向。」在許多國家向現代化轉型的

過程中，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都發揮著「歷史扳道夫」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在 1854 年春天的那個深夜，從吉田松陰潛入美國軍艦的那一刻起，中日兩國不同的現代化命運已經被決定。

羅森沒有、也不可能成為「歷史扳道夫」。即使擠進大歷史，小人物也還是小人物。

五．為甚麼給侵略者樹碑立像？

和中國一樣，日本也曾經長期實行「鎖國政策」，直到佩里率領美國軍艦長驅直入東京灣，才被迫開國。對日本而言，當年佩里仗著船堅炮利迫使幕府簽訂第一份不平等條約，顯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侵略者。可是，後世的日本人並沒有將他視為仇敵。相反，他被視為日本的恩人。早在 1901 年，日本人就在橫須賀市建立起「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上陸紀念碑」

當然，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並不是沒有動搖過。日本突襲珍珠港、引發太平洋戰爭後，這個紀念碑就被推倒，在原地建立了「國民精神振奮碑」。不過，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國民精神振奮碑」又被推倒，重新豎立起「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上陸紀念碑」。

後來，日本人又相繼在東京和北海道建立了佩里的雕像、像英雄一樣崇拜他。直到今天，橫須賀的佩里公園裡每年都組織開國紀念活動，人稱「黑船祭」。在紀念表演活動中，當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態出現。日本人認識歷史的態度，值得深思。

佩里沒有開一槍一炮，就打開了日本的國門。從歷史的角度看，日本對外開放可謂正當其時。正如戰後日本首相吉田茂所說，「日本近代化的發展是十分幸運的。那時正是 19 世紀中葉，先進國家雖然完成了產業革命，但是它們的技術水平仍然處於提高熟練程度和積累經驗的階

段，仍需要不斷接受科學的證明。近代的鋼鐵工業才開始起步，幾乎還沒有出現化學工業，鐵路興建的熱潮也剛剛開始，而帆船還沒有被輪船取代。因此，日本的技術水平並沒有遠遠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日本人還可以一邊有效率的利用自我的傳統技術，一邊加倍努力去追趕西方先進國家的發展腳步。」

當然，日本並不局限在產業技術，而是在科學技術、思想文化、政治體制等各方面全方位地學習西方。特別是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人通過努力追趕，僅僅用三十多年時間就成為亞洲第一強國，將中國遠遠拋在後面。

如果沒有佩里，日本可能繼續閉關自守，最終淪為殖民地。佩里來航確實「成了將幕府統治下的鎖國狀態的日本拉回到了世界的原動力」。如此高的評價給予一個侵略者，在中國人看來匪夷所思。可是，如果剝離道德的評判，以歷史的尺度去丈量，佩里確實是促使日本開放改革、融入世界的有功之人。

假如中國與日本互換位置，中國能夠像日本那樣吸取教訓，面對現實，放棄鎖國政策，融入現代化的世界潮流嗎？顯然不可能。歷史不是沒有給過中國機會。「黑船事件」50年前，英國派使團到北京要求通商，被乾隆皇帝斷然拒絕了。假如中國當時開放國門，就能夠趕上工業革命的第一班車，避免後來的許多歷史彎路。

遺憾的是，1894年甲午戰爭慘敗於日本後，中國才開始全面學習西方。然而那時西方卻進入了一個非常糟糕的失範時代。普魯士式的國家統治經濟與軍國主義強權開始抬頭，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等思潮紛紛興起，並在中國找到了市場。錯誤時間的錯誤選擇，讓中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對一個人來說，要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對一個國家而言，何

嘗不是如此。否則，就會喪失時機，甚至誤入歧途。

歷史當然不可假設，但是它可以啟發我們的思考。在面對歷史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多一些冷靜思考。一百多年來，除了明火執仗的侵略者外，也有很多外國人對中國的文明進步做出了貢獻，我們是不是應給給予他們起碼的尊重？像創辦燕京大學、培養無數人才的司徒雷登，難道不應該給他在北大校園裡豎立一尊雕像嗎？

後記

2018 年是明治維新 150 週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週年。我對中國改革開放歷史和日本近代史都有興趣。在這兩個歷史時點重合的時候來寫本書的後記，讓我產生很多感慨。

我曾經對未來很樂觀，認為任何國家都要走上文明、民主、法治的光明大道。可是面對變幻莫測的世界，近年來我的心中卻產生了迷惑。自從十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們描述這個世界的時候，最常用的一個詞語就是「不確定性」（uncertainty）。站在新舊交替的時點上瞻望未來，我的心中仍然充滿了迷惘。「這個世界會好嗎？」對於梁漱溟先生的疑問，我沒有答案。

顧準先生晚年選擇歷史研究，苦苦研讀希臘城邦制度、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發展史，是因為他心中有巨大的疑惑。誠如他所說，「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顧準文集》，229 頁）。我沒有顧準先生那樣的胸懷，閱讀日本近代史只是為了解決自己內心的困惑。現代化進程中的追趕型國家都面臨許多相似的挑戰，因此經常以先進者為學習對象。很少有人還記得，中國在「以俄為師」之前，曾經「以日為師」。康有為在上光緒帝書中就說，「日本地勢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條理尤詳，取而用之，尤易措手。」當然，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學習另外一個國家，但是由於歷史的相似性，所以能夠啟迪後來的異國讀史者。事實上，過去一年多的閱讀歷程，確實讓我對錯綜複雜的世事多了一些理解。

在閱讀日本近代史的同時，我也在幫助吳敬璉先生編輯他五年來文章選集（書名為《改革大道行思錄》）。和其他經濟學家不同，作為顧準先生的弟子，吳敬璉先生具有思想家的氣質。他面對複雜多變的中國經濟現象，提出「開拓思想市場，研究基本問題，探尋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路徑」。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命題，提醒那些忙於解釋變幻不定的現實經濟問題的學者們冷靜地想一想，中國經濟的基本問題到底是甚麼。假如不解決基本問題，那麼新現象新症狀仍然會層出不窮，所有的臨時性應對之策都無濟於事。其實，吳敬璉先生提出的命題對於研究中國現實社會問題的所有學科都是適用的，因為中國社會現實複雜多變、往復曲折，如果不抓住基本問題，就容易跟著浪潮現象走，就事論事，乃至疲於應付，迷失方向。在這個意義上，「開拓思想市場，研究基本問題，探尋中國現代化的現實路徑」應該成為直面社會現實的思想者們的共同追求。

作為一記者，我願意做這個時代的記錄者，也願意思考一些基本問題。這本書記錄了我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粗淺思考，希望讀者朋友們的批評。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與當初發表的稿子已經有很大不同。最初的文章既有歷史人物，也有重要事件，本書講的都是歷史人物（或以歷史人物講述歷史事件），因此主題和結構更加鮮明。這要歸功於責任編輯楊克惠女士。她對原有的60篇文章選擇梳理，合併裁剪，我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修改，才有了現在的模樣。

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輩看過書稿後說，這本書好像沒有寫完，應該寫到日本戰敗。確實，從大歷史的角度看，自1853年黑船來航至1945年宣佈無條件投降，是日本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完整階段：開國—追趕—崛起—歧路—毀滅。這是一個以成功始、以失敗終的故事，說明了現代化是一個充滿荊棘的道路，只有戒慎戒懼，才有可能避免歧途（1945年

日本在美國佔領下才重啟現代化進程，我將之稱為日本的「現代化第二波」，基本上是成功的）。本書雖然多處指出明治晚期已經出現了歧途，畢竟沒有將故事講完。我希望有時間寫一寫 1912 年—1945 年間日本的人物。在這期間，日本所有的舉措看起來好像都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日本人正是在贊同、甚至歡呼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舉措中被捲入了戰爭深淵。雖然有個別清醒者沒有被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潮流衝昏頭腦，但是大部分、包括知識精英都成為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吹鼓手，推波助瀾。許多人（特別是青年軍人）確實不願意假裝看不見社會的不公，不願意假裝聽不見民眾的哭聲，可是他們努力的結果卻是將國家推進災難的泥潭。這不是更大的悲劇嗎？我相信，這對於那些追趕型國家更具有警示意義。

感謝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王占陽教授，他是我到日本做訪問學者的推薦者，也給我很多指導。感謝日本國際交流基金（The Japan Foundation）的邀請，使我在日本度過了四個月美好而充實的時光。感謝基金會的野口裕子女士、安富世里加女士和張啟明先生的關照，感謝加茂具樹（慶應大學教授）、李卿（慶應大學研究生）、伍曉鷹（一橋大學教授）、大平正嗣（日本駐華使館）、馬欣欣（一橋大學準教授）、津上俊哉（經濟產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關志雄（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首席研究員）、中兼和津次（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村田雄二郎（東京大學大學院教授）、城山英已（時事通信社外信部編集委員）、吉岡桂子（日本朝日新聞編集委員）、仲谷明洋（日本駐華使館），以及榮劍先生、陳浩武先生、孫雲曉先生等師友給予的無私幫助。在日本期間我還認識了許多友人，他們的友誼讓我銘記在心。

感謝《財經》雜誌社給予我自由而寬鬆的工作環境。在目前的社會裡，這樣的環境難能可貴。本書的文章大部分在「界面」網站發表過，感謝

「界面」聯合創始人、CEO 何力先生，他是一位卓越的媒體領導人，給予我很多支持和幫助。感謝「界面」新聞執行總編輯張衍閣、文化編輯劉溜和黃月的辛勤工作。感謝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總經理陳翠玲女士、總編輯呂愛軍女士、責任編輯楊克惠女士，她們為本書的編輯付出了辛苦。這家出版社出版了許多好書，此前和我有過愉快的合作。

最後，還要感謝愛人方虹給予的支持。馬浩宇同學已經是高中學生，他有時和我討論日本近代史問題，一些觀點對我很有啟發。眼看著他健康長大，對問題有自己的思考和見解，我的心中充滿了幸福的陽光。我衷心希望他們這一代人生活在一個和平、民主、繁榮、文明的世界裡。

這個世界會好起來的。

馬國川

2018 年 5 月 4 日，五四運動 99 週年之際